

安全與發展不是單項選擇而是正向循環

林鳴謙

議事論事

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究竟應當如何理解「治」與「興」之間的關係？龔之平日前發表《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是連貫統一的過程》，針對一種看似頗有市場的觀點作出辨析：既然香港已經完成香港國安法實施、完善選舉制度和基本法第23條立法，是否可以認為維護國家安全的事情「做得差不多」，今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即可？

這個問題表面談的是工作次序，實質涉及對香港治理規律的認識。龔之平文章深刻指出，「**由亂到治**」與「**由治及興**」並不是兩個彼此分割、先後交替的政策階段，而是一個連貫統一的治理進程；**安全與發展也不是此消彼長的資源競爭，而是互為條件、互相支撐的制度關係**。從現代治理理論看，這一點並不難理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研究制度變遷時指出，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為社會交往提供穩定結構、降低不確定性。市場經濟尤其如此。企業作出一項十年投資，銀行批出一筆長期貸款，

家庭決定置業、生育或者安排子女教育，背後都有一個共同前提：人們相信明天大致可以預期。因此，安全並非經濟發展之外額外增加的一項「成本」，恰恰相反，**穩定的政治秩序、清晰的法律規則、可靠的公共治理，本身就是一座城市最重要的制度資產**。

香港是一個高度外向型經濟體，資金、人才、貨物、資訊以極高頻率跨境流動，這種城市比一般經濟體更加依賴制度可預期性。一旦基本秩序受到持續衝擊，最先上升的往往不是賬面上的某一項支出，而是整個社會的「不確定性成本」：投資者延後決策，企業減少長期配置，人才重新考慮去留，政府治理資源大量耗費於處理衝突。

2019年的香港正是最直接的現實教材。當政治激化與暴力衝擊蔓延，交通、商業、旅遊、零售乃至市民日常生活都受到影響。這充分說明，一座國際商業城市不可能把政治安全、社會秩序與經濟運行分割處理。中央其後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特區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所重建的不只是表面的社會秩序，更

重要的是重新確立一套穩定、可持續的制度預期。

2026年上半年，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5.1%，是近五年最強勁的半年度表現；政府亦把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上調至3.5%至4.5%。第二季貨物出口實質增長28.9%，私人消費開支則連續第五季錄得增長。國際評價亦出現明顯變化。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2026年世界競爭力年報》把香港排名提升至全球第二，其中政府效率全球第二、營商效率全球第三；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香港保持全球第三、亞太區第一，與紐約、倫敦的評分差距進一步收窄。

資本的選擇更加直接。今年上半年，投資推廣署協助413家境外及內地企業在香港設立或擴展業務，預計帶來逾530億港元直接投資和逾8600個職位；2025年香港境外及內地母公司企業數目增至11070家，初創企業亦達5221家，兩者均創新高。

當然，不能把所有經濟改善簡單歸因於某一項制度安排，國際利率、環球貿易、人工智能需求、內地經濟以及市場周期都在發揮作用。但同樣不能忽略一個基本事

實：沒有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上述機遇即使出現，也未必能夠轉化成香港的現實收益。這就是安全作為「制度資產」的意義。

龔之平文章提出「以發展為安全的保障」，同樣不可忽視。安全不能只靠法律和執法維繫。一個社會如果經濟長期停滯、青年缺乏向上流動機會、住屋問題久拖不決、產業競爭力下降，即使表面秩序穩定，深層社會矛盾仍可能不斷累積。因此，「由治及興」最終必須體現在普通市民可以感知的生活改善。

近年香港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由本屆政府上任前最高6.1年降至最新4.8年；取消強積金「對沖」已於2025年實施；法定最低工資改行一年一檢，今年5月調升至每小時43.1元；《僱傭條例》「連續性合約」新規定今年亦正式生效。這些看似與宏觀安全沒有直接關係的政策，實際上都是提升社會韌性、增強市民生活確定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見，安全創造發展的條件，發展又不斷擴大安全的社會基礎。兩者不是一道單選題，而是一個正向循環。

今天重新討論安全與發展，重點已不應停留於「重安全還是重經濟」，而應進一步思考：香港如何以更低的制度成本、更精準的風險治理、更高的行政效率，同時拓展安全與發展的空間。

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特區政府正編制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未來北都建設、國際創科中心發展、金融市場深化、內地企業「走出去」、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都會帶來更大的資金、人才、數據和產業流動，也必然伴隨更加複雜的風險。發展層次愈高，安全能力也必須同步提高。

所以，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並不意味着香港可以把「安全」這一頁翻過去；更準確地說，是香港已經有條件把安全從危機處置提升到常態治理，把穩定優勢進一步轉化成發展優勢。

安全是底板，而不是天花板。把底板築得更牢，目的不是停留在「不出事」，而是讓企業敢投資、人才願意來、市民對未來有信心，讓香港能夠放心地發展更快、走得更遠。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從民族性格看日本加速右傾化趨勢

嚴思

觀世界

8月15日，日本執政的自民黨高層首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右傾化又向前邁出危險的一大步，引起世界各國和國際有識之士的極度警覺，同時也讓相當一部分人感到迷惑不解，為什麼日本沒有汲取歷史教訓，又重新走上邪路，而且越走越快。性格決定命運，透視日本民族性格，我們可以從中找到答案。

國土狹小、資源匱乏、災害頻發等因素讓日本民族具有強烈危機意識，對優劣變化極度敏感，極度慕強，但也因此缺乏原罪精神。日本國教神道教認為萬物皆神，人性的欲望、過錯、暴戾都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違背神明的罪惡」。章太炎先生多次撰文稱日本「服強不服善、重小節輕大義」。嚴酷的內外環境要求日本民族必須抱团取暖，高效協作，使日本形成了基於強烈集體主義精神上的極致嚴謹的社會秩序，讓日本社會習慣於以集體顏面和外界看法作為評價標尺，形成了獨特的「恥感文化」。這種社會秩序也讓少數權貴成為制度的受益者，迫使個體極度隱忍、從眾盲從、極度壓抑了理性思維和社會活力。小國寡民、孤懸海外讓日本眼界局促，缺乏大局把控能力，也造就了自卑的性格底色。毛澤東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日本看重局部得失，缺乏長遠全局思維。為掩飾自卑，日本構建了神國敘事和民族優越論，盲目自負，缺乏自省和包容意識。

看重局部得失缺乏全局思維

日本民族性格中的缺陷是日本右傾化的重要根源。強烈的危機感和民族優越論讓日本右翼勢力和部分日本民眾認為對外擴張是改變惡劣生存環境的最佳途徑，認為東條英機等戰犯是「為國開疆擴土的忠靈」、日本近代的對外侵略是「解放亞洲」。「恥感文化」讓日本右翼勢力認為決不能在歷史問題上認錯，否則會使日本顏面盡失，成為難堪的「污點」，也會讓日本國民精神和意志萎靡，降低日本在惡劣環境中的生存能力。

日本民族性格中的缺陷也成為日本右翼勢力氾濫的溫床。集體主義精神被日本右翼

利用，成為其和權貴財閥深度綁定、掌控國家、弱化民權、攫取利益的重要思想武器。極度的隱忍雖然讓日本民眾能夠承受更大更長期壓力，但也會積聚巨大势能。當環境發生極致變化、超出其隱忍極限時，這種勢能會宣洩而出，形成強烈的非理性社會躁動，而日本民眾獨立思考能力的不足和從眾意識的慣性則會進一步放大這種非理性的躁動。這種社會的盲動和非理性常常被日本右翼勢力，尤其是極右勢力利用，成為其上台執政、左右日本國運的重要契機。右翼勢力的操弄和日本民族性格固有缺陷相疊加，往往讓日本在順境時猖狂妄為，如「九一八」得逞後貿然發起全面侵華戰爭，上世紀80年代末狂言「日本可以對美國說不」；在逆境時瘋狂決絕，如二戰末期時的自殺衝鋒，屢屢讓日本陷入深淵。

當前日本加速右傾化正是日本衰敗突破民眾隱忍極限、日本社會被右翼勢力裹挾利用、陷入逆境瘋狂的結果。近幾十年日本國家治失、社會僵化、經濟低迷、民生凋敝，少數人在市中中狂歡、卻讓多數人用痛苦買單，普通民眾卻連大米都快吃不起。日本國際地位也持續下降，經濟總量被中國大幅超越。2011年初，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讓日本上下極度震驚。日本媒體對該消息的報道數量竟超過了同期發生的3·11大地震和福島核事故。這些形勢的變化讓日本民眾倍感失落和失望，危機感和焦慮感爆棚，突破了長期極度隱忍的心理閾值，日本社會爆發出極其強烈的圖變求治動能，這就給日本右翼勢力裹挾利用敞開了便利之門。

身為極右翼的高市早苗利用日本社會躁動非理性的心態，操演歷史修正主義、渲染外部威脅轉移國內矛盾，用對外強硬、對內許諾短期利益，包裝出敢作敢為人設，勾畫出能帶領日本「強國雪恥」假象，成功迷惑了有着強烈改變現狀、尋求情緒宣洩需求的眾多日本民眾，帶領自民黨獲得了超高的支持率。不僅讓自己打破男權壟斷的日本政壇傳統，異軍突起當選首相，而且倒行逆施肆無忌憚，做出一系列傳統右翼政客不敢說不

敢做的擴軍、叫囂修憲、擁核、干預台灣事務等冒天下大不韙的舉措。日本這種現狀是時與勢以及日本獨特民族性格共同作用的結果，沒有高市早苗也會有其他「毒苗」出現。

高市政策加速日衰敗

日本衰敗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老齡化、長期政策失誤、貧富差距增大、社會僵化及創新乏力導致的內生增長動力持續減弱。高市政權的應對之策是對內新瓶裝舊酒、飲鴆止渴，採用激進財政寬鬆政策能解決短時之困，但這會進一步增大日本滯脹和債務壓力，日益深陷加息則加速債務泡沫破裂，不加息則通脹高企、日圓貶值、民怨洶湧的兩難境地。對外是逆勢而為，無視國力衰退不濟，內禍外引，瘋狂修憲擴軍，對外示強，以消除民眾的安全焦慮，但這將遭到更多國際反制，加速日本國力透支。

高市的內外政策不可能帶領日本走出低谷，將進一步加速日本衰敗，使日本民眾更加焦躁和失去理性，有可能讓日本性格的缺陷進一步放大、社會更加右傾、更多類似高市早苗的極右翼分子橫行日本政壇、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更加成勢為患，國家政策更加短視、冒險，陷入越右傾越衰敗、越衰敗越右傾的惡性循環，將會再一次將日本帶入深淵，也會給世界帶來更大風險。

命由心生，面對惡劣形勢，要逆天改命，日本民眾必須要認清形勢，跳出性格和思維的窠臼，不再被日本右翼勢力蒙蔽、裹挾和利用，對內要增強理性自主意識，堅決推動社會徹底變革，打破利益藩籬，消除僵化秩序，重塑國家活力與競爭力。對外要擺正心態、深刻反省歷史罪責，糾正錯誤傾向，同軍國主義徹底切割，以實際行動取信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甚至成為他國的炮灰。

不施雷霆手段不顯菩薩心腸。對於日益右傾的日本，國際社會不能縱容，必須予以嚴正警告，用實際行動鮮明表達立場，給日本右翼勢力當頭棒喝，給日本社會有識之士強力支持，這是對日本負責任的態度，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需要。

立法會議員

議事廳

陳祖恒

早前完成為期七天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行程緊湊、研討深入。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筆者認為，立法會必須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立足國家大局，踐行「以人為本」的理念，持續深化良性互動的行政立法關係，並以「主動擔當」的姿態積極作為，把握國家「十五五」黃金機遇，為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建言獻策，將國家的宏觀藍圖高效轉化為香港高質量發展的實質動能。

是次研修考察內容豐富，涵蓋國家治理、總體國家安全觀、依法治國、行政主導體制、城市治理及創新科技等核心課題，為議員帶來多維度的戰略啟發，進一步提升了我們的履職能力與宏觀視野。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聽取行政長官李家超述職報告時指出，特別行政區政府要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筆者認為，香港各界可從三大維度深入貫徹行政主導，將制度優勢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動能。

第一，堅守行政主導根基，把制度優勢轉化發展動能。基本法從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確立了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實行行政主導，是維護特區憲制秩序、實現特區高效治理的必然要求，也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有力支撐。

社會各界須堅定支持和配合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不斷提升特區治理效能，攜手促進特區經濟繁榮發展、改善社會民生福祉，實現「以安全促發展、以發展保安全」。

第二，站位國家全局，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隨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家「十五五」規劃為未來五年的發展繪製了宏偉藍圖，特區政府亦全速編制香港首個五年規劃，香港迎來黃金發展機遇期。

香港各界應具備大局觀，立足國

家整體利益思考自身定位，深入掌握國家對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和內涵，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助力國家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搶佔先機。

以筆者代表的紡織製衣界為例，業界多年在國際供應鏈中深耕，優勢顯著，同時從多維度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筆者與業界將繼續支持和配合特區政府施政，為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建言獻策，期望在供應鏈管理、新質生產力、文化創新、品牌出海、人才培养等層面，以業界所長，助力國家打造品牌強國。

第三，深化行政立法良性互動，務實建言促政策落地。在行政主導原則下，行政與立法既互相支持，又互相制衡，形成良性互動。筆者在過去幾年，一直與特區政府各部門保持密切協作和提出建言。深刻感受到，要推動政策優化方案醞釀落地，既離不開深耕細作，也要透過與相關部門的緊密協作交流，同時議員要主動換位思考，理解政府在執行層面的實際局限，進而提出兼具建設性和可操作性、立足國家大局和香港整體利益的政策方案和建議。

通過良性互動，筆者與經民聯及業界的大量建議，獲特區政府積極接納和回應，包括推動並優化了多項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助力企業「走出去」的政策舉措；敲定每年舉辦「香港時裝薈」活動，今年即將迎來第三屆；筆者最近也積極就強化香港的跨國採購樞紐定位建言，期望政府採取針對性策略，包括建議當局為合資格的海內外採購中心及辦事處提供半稅甚至低至5%的優惠稅率，大力吸引海內外企業採購中心「引進來、引回來」。

期望社會各界同心協力，在行政主導的良好氛圍帶動下，以更多實際行動，為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更積極貢獻。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

中國經濟平穩向優 仍需激活內需動能

宏觀微觀

軒轅靖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1至7月，中國經濟交出了一份「總體平穩、向新向優」的成績單。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3%，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4.7%，貨物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17.3%。而社會消費商品和服務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6%，其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僅為1.2%。

總而言之，前7月中國生產端穩健有力，外貿端高速增长，消費端相對疲弱。因此，「供強需弱」仍是當前經濟運行中最突出的結構性矛盾。

從生產端看，工業經濟的「向新」成色十足。前7個月，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7%，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增長13.8%，分別快於全部規模以上工業4.4和

8.5個百分點。7月份，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速進一步提升至16.9%。

創新驅動的新動能正在加速成長，工業新動能對規模以上工業增長的貢獻已達五成。與此同時，服務業平穩增長，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10.6%。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在產業升級和數智化轉型方面步伐堅定，供給側的結構優化成效顯著。

今年前7個月，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突破30萬億元，達到30.13萬億元，同比增長17.3%。7月當月進出口4.66萬億元，同比增長19.2%，已連續5個月超過4萬億元。出口17.44萬億元，增長14%；進口12.69萬億元，增長22%。對東盟貿易增長20%，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增長15.5%。

外貿的強勁韌性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內需的不足，但這種「外熱內冷」的格局本身也揭示了問題的癥結所在——如果內需遲遲不能有效激活，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將難以持續。

需求側的不足正在成為制約經濟持續向好的關鍵瓶頸。消費方面，7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僅0.6%，低於市場預期的1.5%，也較6月的1%進一步回落。儘管服務零售額同比增長5%，快於商品零售，但7月服務消費增速同樣有所走低。投資方面同樣不容樂觀，1至7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6.7%，降幅比上半年擴大1.0個百分點；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9.4%；房地產開發投資下降19.2%。即便剔除房地產開發因素，投資仍下降3.7%。投資與消費兩端同步走弱，折射出內需動

力不足的深層隱憂。

儘管如此，消費升級和結構優化的積極變化仍然存在。1至7月，鄉村消費品零售額增長2.4%，快於城鎮的1.1%；限額以上單位糧油食品類、通訊器材類、化妝品類商品零售額分別增長7.2%、15.1%和6.3%；網上商品和服務零售額增長4.8%。

這些消費亮點說明，消費市場並非全面萎縮，而是在分化中蘊藏着轉型的機遇。但整體增速的受限表明，居民消費意願和能力仍受到收入預期、就業形勢等多重因素的制約。第二季度以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同比增速放緩，是消費增速下行的重要原因。

面對內需不足的突出矛盾，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要求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加力擴大內需。國務院總理李強日前主持召

開國務院全體會議，表示當前內需不足問題仍然突出，要抓好就業增收，協同推動投資於人和促進消費。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期。外需的強勁固然令人欣慰，但一個超大规模經濟體的長期健康發展，終究要建立在強大內需的基礎之上。1至7月的數據已經清晰地表明：生產端的轉型升級正在加速推進，但需求端的有效支撐尚顯不足。

下一階段，需要在穩就業、增收入、強預期上持續發力，讓居民「敢消費、願消費」；同時優化投資結構，引導社會資本流向新質生產力領域，讓投資真正成為擴大內需的有力支撐。唯有供需兩端協同發力，中國經濟「向新向優」的發展態勢才能行穩致遠。經濟學者